

西南联大·昆明记忆 ①

文人与文坛

西南联大
四十年代昆明文化剪影

著

者

余

斌

图
片

唐

笙

余

晓

夕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西南联大·昆明记忆 ①

文人与文坛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著者 余斌
图片 唐云笙
余晓夕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人与文坛/余斌著;唐云笙,余晓夕图片. —昆明:
云南民族出版社, 2003.10

(西南联大·昆明记忆①)

ISBN 7-5367-2765-8

I.文... II.①余... ②唐... ③余... III.随笔—
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94081 号

策 划:李安泰

责任编辑:郑卫东

责任校对:张 哲

装帧设计:李 木

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昆明市大观路 94 号 邮编:650032)

<http://www.ynbook.com> ynbook@vip.163.com

云南民族印刷厂印制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6.625 字数:100 千

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01-3000 定价:15.00 元

ISBN 7-5367-2765-8/I·622



余斌，文学批评家，教授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36年生，昆明人。195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，之后在西北从事文艺编辑工作，从《红旗手》到《当代文艺思潮》。八十年代末回滇从教。1997年获高校教师曾宪梓奖。出版专著《中国西部文学纵观》。代表性论文有《对现实主义深化的探索》、《边疆：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的重叠》和《论中国女性文学纵深意识的演进》。八十年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“文学评论”（中青年）优秀论文奖一次，九十年代获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次。1993年被评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。

城市的文化地图

——为余斌先生《西南联大·昆明记忆》而作

汤世杰

边地云南，“二战”中有两件大事，值得我们永世记取。一是滇西抗战，中国军民以三年多时光和十数万血肉之躯，与日军在怒江隔岸相峙，最终发起反攻，全歼入侵之敌，惨烈悲壮，浩气长存。一件则关乎文化——各地的文人学子，齐聚战时的昆明，群贤毕至，如灿烂群星，辉映边城。他们在极艰难的条件下，传道，授业，思索，研究，写作，创造，养成了一大批学界精英，文化血脉借此得以传承延续，成就了后世难以企及的辉煌。前者为武，后者为文，一文一武，皆可歌可泣，可圈可点，专家、学者，对之考证、研究、阐发者众，至今，仍时有新著问世。



余斌教授关注的是后者，所著《西南联大·昆明记忆》，一题三卷，以著者在昆明历时多年的寻访为线，以40年代居于昆明的文化人散落四方的住处为点，经经纬纬铺撒开去，重现诸多文化人的寓所行止，日常起居，揭示当年昆明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化风景，一如20世纪40年代战时昆明的文化地图，引我们徜徉其间；眼光，是当代文化研究者的眼光，笔触则温润怀旧，如拊掌闲谈，满眼战时风雨，书生颜色，读来兴味盎然。

昆明是个奇异的移民城市，偏远也实在偏远。当年交通不便，道路滞涩，从北京、天津、上海到昆明，或一路步行，筚路蓝缕，辗转数省，或由经水路，绕道香港，风雨颠簸，都要吃些苦头。然时势所迫，数年间，仍有无数学人聚集于此。幸好当年的昆明，气度足够的大，不仅包容、融合了各种思潮，还让各种思索以它们自己的方式，在这里生长，壮大，开花，结果。一座“西南联大”，因此造就了众多科技、人文精英，至今让人唏嘘感慨。有文章说，在美国某著名大学，出身于“西南联大”的博士、教授和研究人员，占到将近一半的比例。这数字相当惊人，是不是准确，我不好说，但我相信那个大体的估计，并无夸大。而当年的条件，却极简陋，极寒伧。看来所有优秀的文化成果，从来都不出在权位之家，也与豪华别墅、妻妾如云无关。中国知识分子“价格”的低廉与智慧的超人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当年那些文化人，既无重点学科经费，也无“专家”补贴，既无藏书丰富的图书馆，也没有具有起码条件的实验室，躲警报钻地洞是常事，坐趟马车上班，已属奢侈，却一边著书立说，一边殚精竭虑地思索，一边走访民间探索调查。衣食住行都极为艰苦，庶几只可维持温饱。比如住，那些文化先驱，学界巨擘，并不都住在“联大”校园，倒是见缝插针，散居于昆明僻街陋巷，

有的为避战火，求清静，甚而远遁至今仍属远郊的城市边缘。所谓安定，也非有厅堂楼阁，不过是临时租用的房子，或民宅、农舍，或古寺、旧庙，甚至是自建的简易房屋。据我所知，仅昆明北郊龙头村及附近的棕皮营、麦地村、司家营、落索坡一带，当时就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、中国营造学社、清华文科研究所等几大研究机构和北平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的工作站，租用当地的一些寺庙、祠堂，作为研究场所。在那里住过、工作过的著名人物，据一份不完全的名单所说，就有哲学家冯友兰、金岳霖，考古学家李济、梁思永，建筑学家梁思成、林徽因，政治学家钱端升，史学家傅斯年、顾颉刚、吴晗，语言学家李方桂、王力、罗常培，文学家朱自清、闻一多、陈梦家、光未然，音乐家查阜西、赵讽等等。在昆明的大西门、文林街、青云街一带，如今看上去毫不起眼的一幢民宅，当年也藏龙卧虎，常有风云际会，高人出入。世事沧桑，人去楼空。那些房屋，或历经风雨，朽烂拆除，或遭遇改建，面目全非。尽管这些年来，人们对那些文化人的文化建树，已多有描述与探索，但那些留下过文气墨香的老屋，那批文化人当年的俭朴生活，在那样的环境中，他们究竟怎样过日子、做学问，怎样与当地人士相处等等，却仍少有人去涉及。

余教授乃有心之人，从上世纪90年代起，赶在城市扩建、大举拆迁之前，以闲暇时光，不辞辛苦，走街串巷，远赴郊野，费心费力地四处寻访，每查实一处，便欢呼雀跃，行诸文字，以昭告世人。往往他前脚刚走，拆迁大军便汹涌而至，真让人有失之分秒，便将痛然错失无可挽回之叹。初见余先生那些短文，每每惊讶余先生有那样的雅兴，也叹服余先生有那样老到、简捷与干练，又无处不浸透他温润性情的文字。不久，那批文章陆续见诸报端，编者、读者好评如潮，便是

意料中事了——一个人，凡用心用功做的事，用了几份心，几份功，外人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。随后，《云南日报》“文化周刊”记者，多次报道他们如何跟随余先生，前往探访抗日战争时期文化人在昆明的旧居。足见社会、读者，对余先生的此类写作，有着怎样浓烈的兴趣。那时我想，如果按余先生的文章，将当年众多文化人的住所一一标记在昆明地图上，不就是一幅“二战”时期昆明的文化地图吗？这幅文化地图，奇特、新颖，迄今为止，在别的地方，别的城市，还没见过。一座城市，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地图。没有文化地图的城市，是缺乏底蕴的城市。余先生奉献的这幅文化地图，当然是历史绘制的，是当年客居昆明的文化人，知识分子，与昆明民众一起绘制的，用他们的生命、智慧、血性与良知。余先生的功劳，在于他锲而不舍的寻微访幽，辛勤重访，校勘订正，考察标记，才使得这幅战时昆明的文化地图，得以完整如初地奉献给当今的读者。

“礼失而求诸野”。近些年的云南，“文化地理散文”的写作风头正劲，许多作家、学者，不畏岁月湮没，山路迢遥，踏遍山山水水，穷乡僻壤，搜寻探求云南的文化渊源，出版了不下数十部文化地理散文，一时蔚成大观。这些作品，不仅出自一般被称为作家者之手，也出自社会科学工作者、新闻工作者之手。像余先生这样，专心致志就近在昆明寻访的，却也不多；或有，也止于市井里巷，风土人情，对西南联大时期的文化人生活，甚少触及。细细想来，余先生属意此事，前有多年的魂牵梦萦，继有占尽先机的天时地利人和，当是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。

先生自幼长于昆明，青春年华，负笈远行，求学他方：20世纪80年代初，远在塞上，所参与之《当代文艺思潮》，发风气之先，挟雷携电，震荡域内；80年代末回到家乡，作

为学者、教授和文学理论研究专家，于教学研究之余，转而追寻20世纪40年代昆明的文化景观，先生此举，乃出于一个当代学者，对老一代学人不卑不亢、矢志不移精神的缅怀与景仰，下笔尽管温文尔雅，看似闲情，却有真性情流露，有真见解示人。对那批文化人在昆明生活的具体环境，先生尽心尽意的描述，不仅因为他本人就是“老昆明”，可藉此展示他儿时的记忆，倒是有更深一层的动因。恰如法国人文地理学“年鉴学派”早期代表人物费弗尔在其《大地与人类进化》一书中所说：“地理环境无疑构成了人类活动框架中的重要部分，但是人本身也参与形成这一环境。”地理环境或空间，不只是一种自然的、与人无关的背景或舞台，人类在对某片地理环境做出最初的叙述后，便像烟云一般消散，事实上，它像空气一样渗透、弥漫在历史、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与人们每日每时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。任何人，都会受到具体生活环境的影响，文化人当然也不例外。他们是文人，也是常人，也要吃喝拉撒睡，也有喜怒哀乐。他们能取得学术成果，既因为他们自己的天分，也因为这片土壤的滋养。如此，展示当年他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及其文化，意义就非同一般了。同样是这片土地，后来的情形，似乎并不怎么好。个中缘由，值得研究。如果读者从本书看到的，不仅是一些史实，还有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志向、敬业与辛劳，能给当代人以启示与借鉴，思考我们的教育，该如何改造，我们的文化事业，该如何建设，我们的社会，该如何发展，则幸甚，幸甚。

我所知道的余先生，乃儒雅之士，性情中人，说话做事，亲切平和，从不张扬，他的写作，无论专著、论文，还是随笔、小品，皆自主独立，属于真正的生命性写作，决不人云亦云，也从无吹捧粉饰，倒常于精微雅致之中，深藏智性的

创见，善意的犀利与率性的独到。细品余先生这类文字，几乎从不见形诸于外的“用力”之处，总是娓娓道来，行于当行，止于当止，自有他泊于自然的潇洒。这样的文字，与那些自以为可以横行天下称王称霸者，真乃天上地下。他所述的那些文化人在昆明的经历际遇，不管乖僻怪异，还是中规中矩，也多随缘任运，如水流云在，很少“做意”之痕，甚而剑拔弩张之态。所记者，不管后来只是寻常书生，抑或终成旷世才俊，如今也多如已逝之水，但在余先生笔下，他们的书生意气，学问风格，脾气秉性，一如半个多世纪前边城昆明的江湖旧事，读起来仍滋味深厚，有睛光闪烁，有血丝粘连，有豪气喷洒，带给我们的，是智者思绪的超然飘逸，人生甘苦的深长回味。这样一幅“文化地图”，不是一幅精美却苍白的纸质印刷品，斑斓杂驳，却鲜活跳脱，凸现出的，是那一代文化精英的人格魅力、血性与体温，有着沉沉的分量。一个城市，当然不止一幅文化地图。来日若要为当代昆明绘一幅新的文化地图，余先生已用自己的方式，标明了自己的方位，这就足够了，我想。

2002年12月8日~12日

于昆明北郊

目 录

- 1 城市的文化地图
——为余斌先生《西南联大·昆明记忆》而作 汤世杰
- 1 初到昆明的冰心
- 6 冰心与呈贡
- 13 闻一多在司家营
- 18 冯至在昆明
- 27 “被云南人驱逐出境”的李长之
- 34 本地人与外省人
- 42 楚图南论云南人爱听恭维及其他
- 50 沈从文为什么有自卑感
- 57 沈从文的另一面：自负
- 63 新月西沉
- 70 光未然在昆明
- 76 王佐良：昆明现代派的喉舌
- 84 没有野人山就没有诗人穆旦
- 91 播撒现代派种子的燕卜苏
- 96 林徽因在巡津街



104	林徽因对昆明的最后记忆
110	斗南村：李广田与“胜利”赛跑
116	早就写过“孔雀胆”的施蛰存
123	高文化含量的《路南游踪》
132	楚图南的《路南杂记》
140	老昆明话剧舞台
147	曹禺、闻一多联手推出《原野》
154	“新中国”在昆明
162	《野玫瑰》昆明出台前后
168	滇戏知音
174	农村唱灯习俗与徐嘉瑞的花灯研究
181	从大三弦舞说到《九歌》
186	马思聪的两次音乐会
190	一知半晓说“艺专”
198	后 记

初到昆明的冰心

抗战前期，冰心在昆明、呈贡生活了近三年。她关于这一段生活留下的文章并不多，但几乎篇篇都说到对昆明的好印象。她一家是1938年秋天来到昆明的，走的是经香港、越南乘小火车来的路线，到的时候已是夜晚。第一印象是：“记得到达昆明旅店的那夜，我们都累得抬不起头来。我怀抱里的不过八个月的小女儿吴青忽然咯咯地拍掌笑了起来，我们才抬起倦眼惊喜地看到座边圆桌上摆的那一大盆猩红的杜鹃花！”^①

吴文藻当时是应熊庆来校长的

^① 《我的老伴——吴文藻》。

三四十年代的金马坊（唐云笙提供）



聘请，经与多方联系妥当后，来云大用英庚款设置社会人类学讲座并进行教学的，冰心及家人随行。他们下榻的那家旅店叫昆明大旅社，在南屏街（靠近日楼，今新华书店斜对面），是昆明第一家集住宿、沐浴、理发和出租汽车为一体的旅店，条件不及巡津街的法国商务酒店，但还是可以的。

然后找房子。先是住在螺峰街，是朋友们帮忙找的，“说是有一位M教授的楼上，有一间房子可以分租，地点也好，离学校很近。我们同去一看，那位M太太原来就是那位我的同事的女儿！相见之下，十分欢喜！那房子很小，光线也不太好，只是从高高的窗口，可以望见青翠的西山”。^①

这同事的女儿也做过冰心的学生，喜欢诗歌和外国文学，

^① 见《我的邻居》。冰心别的文章也说过她刚到昆明住在螺峰街，此文虽非完全纪实，但所写环境、背景可作参考。

丈夫也是作家，但夫妇关系可能不够和睦，让冰心觉得不太安静，甚至阴沉，所以住了不到半月便想搬家，搬到维新街。这是条背街，在护国路与木行街之间，相互平行。这些年炒房地产，维新街消失了，当年吴文藻、冰心夫妇的寓所，其位置就在今天的天恒大酒店的背后。

当时北京的不少教授、作家汇聚昆明，熟人很多，互相走走，倒不寂寞。冰心常去的地方是柿花巷（今人民电影院背后），那里住了好些位北大教授，其中有自称“三剑客”的罗常培（语言学家）、杨振声（文学家）和郑天挺（史学家）。

维新街离近日楼近，那里又是市中心，冰心少不了常往那边走走。离开昆明去重庆后，冰心写了篇《摆龙门阵——从昆明到重庆》，一下笔就写——

三市街。右为宝善街，左为顺城街。（唐云笙提供）



喜欢北平的人，总说昆明像北平，的确地，昆明是像北平。第一件，昆明那一片蔚蓝的天，春秋的太阳，光煦的晒到脸上，使人感觉到故都的温暖。近日楼一带就很像前门，闹烘烘的人来人往。近日楼前就是花市，早晨带一两块钱出去，随便你挑，茶花、杜鹃花、菊花……还有许多不知名的热带的鲜花。抱着一大捆回来，可以把几间屋子摆满。

近日楼是旧城的大南门，今已不存，原址在今近日公园大花坛的北侧，一面对正义路，一面对三市街。冰心说的“近日楼前”即近日公园，四周有精美的雕花金属栏杆围住，栏外有环形人行道，不宽，冰心说的“花市”就在公园四周的环形道上，卖花的都是近郊的村姑农妇。冰心说一两块钱可以买一大捆抱回去，其便宜可想而知。

1938年9月28日日本飞机九架犯滇，首次轰炸昆明。那时她一家还住在螺峰街，当天冰心正在与刚哭过的M太太说话，劝她别难过，说：“昆明就是这样好，天空总是海一样的青！你记得卜朗宁夫人的诗罢……”正说着，“忽然一声悠长的汽笛，惨厉的叫了起来，接着四面八方似乎都有汽笛在叫，门外便听见人跑。M太太倏的站了起来，颤声说：‘这是警报！’”接着大家胡乱收拾点东西，拉着、抱着孩子向外就跑。“这时头上已来了一阵极沉重的隆隆飞机声音。我抬头一看，蔚蓝的天空里，白光闪烁，九架银灰色的飞机，排列着极整齐的队伍，稳稳的飞过。一阵机关枪响之后，紧接着就是天塌地陷似的几阵大声，门窗震动。小孩子哇的一声，哭了起来，老太太已瘫倒在门边。……”^①

^① 《我的邻居》。

“九架银灰色的飞机”，冰心肯定是抬起头一架一架数过的，这个数字与昆明地方史料的记载完全吻合。^①这可见印象之深。冰心说从那天起，差不多天天有警报。第二年暑假后，冰心就疏散到呈贡去了。

由于亲身经历了空袭和跑警报，冰心对昆明的印象自然也就有了变化，所以她在那篇《摆龙门阵》里还写了这样一段话：

昆明还有个西山，也有个黑龙潭，还有很大的寺院，如太华寺、华亭寺等。周末和朋友们出去走走，坐船坐车，都可到山边水侧。总之昆明生活，很自由，很温煦，“京派的”——当然轰炸以后又不同一点了。

轰炸以后的昆明确实有了点不同。冰心疏散到呈贡去，那里距昆明十六公里，安全得多，自然也安静得多。

^① 详见谢洁吾：《抗战时期敌机袭昆伤亡简记》，《昆明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七辑。作者抗战时任省民政厅主任秘书，有关资料记录甚详。